

无



违

王跃文

作品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T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无

((((●

违

王跃文 作品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违 / 王跃文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
2017.5

ISBN 978-7-5500-2145-7

I. ①无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60680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E-mail bhzw0791@163.com

书 名 无 违

作 者 王跃文

出 版 人 姚雪雪

出 品 人 一 航

责任编辑 杨 旭

策划编辑 康天毅

封面设计 仙境书品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 1/32 880mm × 1230mm

印 张 10

字 数 215千字

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145-7

定 价 39.0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7-8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第一章

尘梦：从小就恐惧这个世界

世界险恶，但不必害怕 _ 002

官场是围城 _ 016

越热闹，越孤独 _ 046

第二章

观闻：中国人的苦心与良心

官场小人物 _ 056

视爱情为宗教信仰 _ 099

我的财富价值观 _ 114

第三章

灵肉：肉体理智多于心灵最高智慧

肉体无处安放 _ 122

只有此岸，没有彼岸 _ 136

第四章

执念：绝望中的永不放弃

孤独与想象是孪生兄弟 _ 152

宁愿痛苦，也要做个清醒人 _ 165

我不是“官场文学作家” _ 186

第五章

天命：我的生命书单

我的文学启蒙 _ 204

八小时以外的官场 _ 219

第六章

逍遥：追求清明平和的生活

在马桶上品茶，看书 _ 238

从大女人到小丈夫 _ 253

第七章

无违：无违于自己，无违于天地

最喜欢《朝夕之间》 _ 276

《国画》之上 _ 300

第一章

小生梦： 从小就恐惧这个世界

世界险恶，但不必害怕

王跃文：从很小的时候开始，世界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恐惧。我们那个村，长期是县里大小运动的试点，经常有县里各种干部出入。那些干部通常是板着脸的，冷不防发现谁说了反动话，就抓住了阶级斗争新动向。村里小孩子哭闹，大人会吓唬说，别哭了，警察叔叔来了！孩子就吓得不哭了。那时候，城里正闹“水老倌”，听说“水老倌”头子勾着食指，塞进嘴里吹哨子，声音有火车笛子那么大，立即就有各路“水老倌”呼啸而来，听从命令。谁惹了“水老倌”，谁就死路一条。“水老倌”，就是城里的流氓。所以，恐惧心理伴随我直到长大成人。30岁以前，我排队买火车票，临近窗口了，胸口就开始狂跳。我知道没有什么值得恐惧的，那高高的窗口里面，无非就是坐着一个脾气不太好的女人。可我的心脏就是不争气，偏要剧烈地跳。我必须反复斟酌一句最简单的话，放在嘴里默念。我练好了这句话，临到窗口再蹦出来。比方说：长沙一张！绝不多说半个字。如果碰上意外情况，比方窗口里的女人说没有票了，

我就慌张得说不出话。我得再从后面开始排队，想好一句话买别的车次的票。

现在，我已不至于再害怕买火车票，但仍然恐惧这个世界。尘世喧嚣，魑魅魍魉，可怕的人和事太多了。

伊渡：您的这种心理感受很奇特。现代心理学认为，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会影响他的终生，甚至他成年以后的思维习惯、行为方式，都可以从童年的经验里找到理由或印证。不知您的童年是怎么度过的？

王跃文：我的童年基本上可称作噩梦。饥饿、孤独、恐惧，纠缠着我整个童年，只是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绝望。因为少不更事，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希望，也就无所谓绝望。2000年，我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折，脱离原来的单位，成了事实上的自由写作者。那年深秋的某个夜晚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几乎原原本本再现了我儿时的生活。梦中，我是副团长。有个晚上，团长突然又任命他自己的弟弟当副团长。我举手反对。团长严肃地对我说：组织上交给你一个光荣任务，深入敌后从事地下工作。我二话没说，掏出别在腰间的手枪，庄严地放在团长手里。团长把手枪交给他弟弟，然后深情地拍拍我的肩膀。团长的手是那么有力，那么温暖。

夜色中，我猫着腰，沿着村子里的土墙和竹篱笆，悄悄前行。遇着行人或狗叫，我便机警地埋伏起来。我不能让敌人发觉。村子的另一头，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。“我是王成，我是王

成，为了新中国，向我开炮！”我多么想投入战斗啊！可是，我不能回到战友们身边去，我得从事地下工作。突然间，不知哪根神经开了窍，我发现自己原来被团长和战友们抛弃了，他们不和我玩了。我马上从游戏氛围中清醒过来。我身陷其间的再也不是什么敌后，而是弥漫着猪屎臭的村巷。我也不想同他们玩了，回家睡觉去！只可惜了那把手枪，那是我跪在门槛上，一刀一刀削出来的。

可是，我不敢去找他们要回手枪。游戏还在进行，我若回去，会被当作变节分子抓起来的。他们会借口游戏，假戏真做，打我一顿。只有等到天亮之后，我才能理直气壮地去找他们。

醒来，我禁不住大笑。原来，我在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被“组织上”抛弃了。

伊渡：我注意到您刚才说到“游戏”二字，感触颇深。儿时的游戏同现实生活中的成人游戏似有共同之处。游戏可以造就一个场，使身在其中的人不辨真假，照玩不误。哪怕有人看出游戏的荒诞，也很少有人胆敢脱离游戏。顽童的游戏还可以不当真，比方你突然发现自己被伙伴们抛弃了，干脆回家睡觉去。可是，现实中的成人游戏，就没那么轻松了。

王跃文：我那天晚上从梦中醒来，大笑之后久久不能入睡，思考的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。我想起父亲被打成右派的遭遇。我读《往事并不如烟》，知道了当年“反右”的很多鲜为人

知的内幕，感慨良多。同基层“反右”不同，上层“反右”多少还是政治斗争，不管其理由如何；基层“反右”就有些像儿戏了，连政治斗争都算不上，无非是别有用心之人借端整人。但是，就因为上层提供了“反右”这么个游戏，基层就玩开了。想整谁，就找些事，把他打成右派。我曾写过篇小文章，真实记录了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经过。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因言获罪，却不清楚他到底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。有一天闲扯，父亲偶尔说起这事，我觉得有些哭笑不得。当年我父亲只有23岁，在家乡的县里任区委书记。县委书记也只有30多岁，书记夫人是县妇联主任。都是年轻人，平时彼此很随便，有说有笑的。那位书记夫人虽说身份尊贵，却是个麻子。有一天，我父亲开玩笑，在她的蒲扇上题了首打油诗：“妹妹一篇好文章，密密麻麻不成行。有朝一日蜜蜂过，错认他乡是故乡。”没想到我父亲年轻时竟如此幽默顽皮，不过这玩笑也开得太过头了。他不知道阿Q因为头上有癞疮疤，在他面前连“光”“亮”都不能说的。但这也仅仅是玩笑，那时候区委书记同县委书记或夫人开开玩笑也没什么稀奇。可是，我父亲做梦也想不到，这个玩笑日后竟会为他带来弥天大祸。

伊渡：您父亲当年被打成右派，难道就因为这首打油诗？简直太荒唐了。

王跃文：是的。1957年，县委书记和他的夫人都想起这首打油诗了。按照当时的逻辑，我父亲的打油诗攻击县委书记夫

人，自然就是攻击县委书记，当然也就是攻击党了。于是父亲罪莫大焉，成了右派分子。一个玩笑，竟让我父亲终身命运逆转。母亲告诉我，父亲是被两个背枪的人押回村里的。父亲虽然没有被判刑，没有坐牢，但他被枪兵押回来，村里人都知道他是坏人和罪人了。记得我读米兰·昆德拉的小说《玩笑》的时候，感觉就像读我们自己国家的故事，只需将里面的人名和地名换成中国特色的就行了。意识形态真是神奇，它能在不同的种族和国度造就同样的游戏。

伊渡：中国近几十年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，造成了极其复杂的官场人格。有时候，种种官场人格只是变化着呈现形式而已。

王跃文：我因为曾经混迹官场，熟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官场的况味。不敢想象我父亲当年竟敢那么胆大。但可以推知，毕竟有那么些年月，中国官场等级并不那么森严。大概从 1957 年以后，上级就是上级，下级就是下级了。同战争年代讲究的官兵一致、军民一致相比，官场规矩越来越复杂化了。现在谁敢同上级开玩笑？上级的威严是不允许冒犯的，而且有的地方越是官大越威严。所以我曾在长篇小说《朝夕之间》里写道，中国的政治最像政治，中国的官场最像官场。

伊渡：您见过很平易近人的官员吗？

王跃文：当然见过，同下级打成一片的官员也是有的。稍微往大些的地方走，说起县长已没什么了不起，因为那是中国比较基层的官员。但是在县里面，县长非常了不得。记得我当时刚参加工作没几年，随县长去沿海地区考察，同去的还有十几个区委书记。那次经历，我感觉官员身上某种神秘的东西真耐人寻味。我们从火车站出发，离家越来越远，县长就越来越随和。一路上玩扑克、开玩笑，很开心。我们在上海、江苏、福建转了一圈下来，县长同下属们几乎混成了哥们儿。直到厦门海滨浴场，县长同我们都光着身子游泳，可谓坦诚相见。县长还拍着自己的裸胸开玩笑说，我们共产党人，襟怀坦白！可是考察结束后，我们往回走时，离家越来越近，县长就越来越严肃。回到县里的火车站，县长又像往常一样板着一副冷脸了。也许县长并没在意自己面孔的变化，正因为他不是故意做出来的，就更有意思。可见官场这个神秘的场，对人的影响是无声无息的，往往也是个中人意识不到的。

现在有些官员同他赏识的下级或企业家混得跟朋友似的，那又是另外的境况。总有那么些人，天天围着官员转，点头哈腰叫“老板”。“老板”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本来已成贬义词，指的是私有企业主或私有财产所有人，现在却常用来称呼有权的和有钱的。你有权，我有钱，就很容易做朋友。何谓朋友？朋友的定义也早已与时俱进了。有人说，能够帮你办成按党和国家政策办不成的事的，就是朋友。有些地方，长官一倒台，牵出一大片，说明这些长官人缘还是不错的。

我回家探望父母，有时会同他们谈谈时事。我的父亲老了，

不知这世上的戏演到哪一出，只是经常嘱咐我一句：别乱开玩笑。

伊渡：我看您的玩笑一直开得很大，我说的是您写的那些在别人看来很大胆的小说。从您的作品中看，您不是个很淡泊的人，您甚至很极端、很尖锐，有人说您眼睛很毒。

王跃文：我为文有些锋芒毕露，但这同做人平和淡泊并不矛盾。生活当中，真正熟悉我的人，很容易把我当朋友。《国画》刚出版时，很多官场上的人托人请我聊天。他们同我见面，多喜欢开句玩笑，说我不怕你把我写进书里去。真有意思。官场上什么物种都有，林子太大了。有位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，有回他在火车软卧车厢里遇着一位看《国画》的人，闲聊中知道他正是我原单位的。朋友便问他，看样子你很喜欢王跃文？那人马上愤然作色，说我恨死他了！朋友把他的奇遇告诉我，又博我一乐。想那位老同事看我的书，正像几十年前流行的一句话：批判地阅读。我原单位很多同事都看过我的小说，多是很坦然的。有的人是躲在家里偷偷地看，也有的拿白纸把小说封面包起来，像小学生包新课本一样，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看，遇着来人了，借站起来打招呼的工夫，身子往前一抵，就把抽屉关上了。真是好玩极了。

我也听很多人说过，官场中人聚餐，其中有我的朋友或熟人，提议请我一块儿去聊聊天。有人马上反对说，千万别请他来，别把我们都写进小说里去。真有意思，不知这些人有什么见

不得人的事情。我得感谢那些反对请我赴饭局的人，他们让我少去很多应酬。我很讨厌这类应酬，得听很多废话，自己也要说很多废话。我明白有些怕见我的人，他们明知道自己坏，却心安理得地做坏人。

伊渡：这么多年来，有什么印象强烈的事情触动过您的灵魂吗？我想了解您的思想发展轨迹。

王跃文：我首先要声明的是我没有所谓思想，也就谈不上什么思想发展轨迹。我只有些片段式的想法，不系统更不深刻。有人说我看问题一针见血，我也羞于承认。我是个凡俗之人，只是不太善于隐藏自己真实的看法而已。我自从踏入滚滚红尘，身边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一切都像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，庸常而无奈。可是，正是这些看上去平淡的人和事，慢慢消磨着我们的人生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越来越莫名其妙。

我刚参加工作时，有位极可爱的南下干部，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。这位老干部姓任，北方人，一字不识，很小就是孤儿。他不知道自己父母的姓名，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个地方的人，只知道自己是北方人。我们单位领导经常说，任老党性最强，要我们向他学习。每到发工资那天，任老就选几张最新的票子，跑到组织委员那里去交党费。我曾把这个细节写进长篇小说《朝夕之间》里。任老最痛恨年轻小伙子的头发长得像女人，他每次参加组织生活会都要为这事发脾气。有一回，有位年轻党员说，头发长短同思想觉悟没关系。毛主席头发长，蒋介石是个光头，结果怎

样？这下可把任老气坏了，一定要求组织上处分那位党员，说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光凭他把毛主席和蒋介石放在一起说，就该枪毙！那位年轻党员马上以牙还牙，说你刚才也把毛主席和蒋介石放在一起说了！任老气得差点儿背过气去。任老的思想很有代表性，有那么一些人潜意识里很怀念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很希望像“文化大革命”那样可以狠狠整一整那些他们看不惯的人。任老还爱讲一件事，就是他当公社书记时，为了不让倒春寒冻坏秧苗，带领社员群众扯着棉被，把秧田团团围住，一站就是一个通宵。哪像现在的年轻人，没有半点儿革命斗志！有个年轻人笑着问他，那不是做蠢事吗？这又把任老气坏了。听说任老曾给某中央领导牵过马，谁也没有看过他的履历，无法证实。任老却很愿意别人提起这件事，他不置可否，只是骄傲地微笑。但你千万不能说他当过某领导的马夫，只能说他当过某领导的勤务员。他听见“马夫”二字就火冒三丈。

有一回我亲眼目睹了任老的一件小事。菜市场里，任老买了菜之后，还要捡走菜摊上的碎菜叶子。菜农不肯，也许是人家自己想留着喂猪。任老就同人家冲突起来。任老穿得像个叫花子，菜农哪里知道他的身份？任老就用一口难懂的北方土话叫骂起来：你知道老子是谁吗？老子身上有五处伤疤，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！没有老子流血牺牲，你还想在这里卖菜？你得给地主当长工、做短工！菜农说，你怎么牺牲了？牺牲了还能在这里做鬼叫？围观群众哄然大笑。任老更加气愤了，说，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，你们还要笑话！

伊渡：您说的任老的故事也许是个很极端的例子，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吗？

王跃文：我当初只是觉得任老有些不合时宜，人还是蛮可爱的。可是，恰恰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说明了生活本身的无聊。荒诞无处不在，已经让我们习以为常。

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，敢到政府门口示威静坐的群众并不多。有一回，几个群众因为一桩凶杀案没有得到公正处理，跑到县政府门口喊冤。任老从政府大门口经过，吓唬群众说：你们有问题可以打报告反映，喊什么冤？要是被美蒋特务拍了照，就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了！喊冤群众看看他的穿着，听他讲话牛头不对马嘴，只当他是疯子，根本不理他。任老十分气愤，跑到县领导那里大摇其头：不得了啦，现在老百姓没有半点儿惧怕了！跑到政府门口闹事，吓都吓不走！原来在任老这样的老干部看来，老百姓理所当然是要怕政府的。

回想我小时候见过的干部，任老讲的话大有来历。我记得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，群众对干部的感觉就是一个字：怕。村党支部书记算是最小的干部了，严格说来还不算国家干部，但老百姓对他们也是害怕的。我们村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正好是我们生产队的，成天黑着脸，从不正眼看人。村里群众遇上他，恭敬地叫声“书记”，他总是鼻子里哼一声。他的工作主要是开会，一般不参加劳动。偶尔，他扛着锄头出现在地头，气氛就紧张起来。我现在还很清楚地记得有一回锄油菜地里的草，社员们边干活边说笑，地里热火朝天。快收工的时候，忽然有人轻声说道：

书记来了。地里马上安静下来。书记横扛着锄头来了，慢条斯理地脱下棉衣，取下手表放在棉衣上面。全村只有他有一块手表。太阳一寸寸靠近山头，社员们早就想收工了，可是没人敢吭声。生产队长是书记的侄子，也不敢说话。大家都自觉地同书记拉开距离，让他像个孤家寡人，独自在田角里锄草。书记威严地劳动了大约 40 分钟，看看手表，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，穿上棉衣走了。生产队长这才喊道：散工了，散工了！

上中学时，我们冬天必须经过一片密密的甘蔗地。有调皮的学生会偷甘蔗吃。有一回，有个同学刚扳断一根甘蔗，忽然甘蔗地里闪出一个人。我们都吓坏了，原来是公社书记。那个偷甘蔗的同学魂飞天外，拔脚就跑。公社书记逮住我们几个无辜的学生，要我们供出那个同学的名字。我们谁也不肯说，就像电影里看到的宁死不屈的共产党人。偏偏有个同学顽皮，说：他叫向天问。意思是叫公社书记去问老天爷。公社书记火了，吼道：我就抓你这个向天问！这个同学很机灵，身子一闪，一溜烟跑了。公社书记追“向天问”去了，我们几个同学也得救了。我永远忘不了公社书记那张胖脸，脸上的肉是横着长的。

我家现在的保姆舒姐，50 岁上下，乡下人。她家里很穷，男人比她大 20 多岁，长年虐待她。照舒姐的说法，那男人手里抓着什么就拿什么打她，不管是扁担或是凳子。有一回，她说起了自己的身世。她原先有过一次婚姻，因为不育，就被她男人休弃了。这时，一个比她大 20 多岁的男人热心地照顾她，说想娶她。她家里穷，没有依靠，就答应了。可是过了几天，她发现这个男人很坏，就反悔了。那男人就威胁说，她已经用掉